

東亞的未來：概念・方法・視野 ——歐盟的借鏡

韓水法

(北京大學 哲學系/外國哲學研究所，北京 100871)



[摘要]東亞未來的團結，或者可能的一體化，甚至聯盟的建立，不能祇寄希望於時勢的自發生成和發展，而應依託於東亞各國民衆和政治家自覺和自主的努力。歐盟以及東亞區域內其他各種合作組織，不僅為東亞各國的團結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也提供了各種可能的途徑和方式。東亞一體化的意義在於：在人權、法治的原則之下，以及在各國平等、協商的基礎之上，充分獨立地面對過去的歷史、歷史聯繫和文化遺產，共同承擔現在、未來需要和應當共同承擔的義務和責任。東亞共同體將會成為世界最主要的文明圈，與歐盟、美國以及其他可能的體系或聯盟共同構成現代世界的主要體系，同時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文明區域。因此，它負有創造性地發展人類多元化文明的責任。從東亞合作、變遷和未來發展前景看，東亞各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差異及其造成的障礙是容易改變的，而浸潤在人們日常生活方式和態度中的社會行為—觀念結構則是起決定作用的。因此，在最大限度地達到共識的前提下，保持不同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特殊性就是一條必由之路。

[關鍵詞]東亞 共識 共同體 歐盟 借鑒

[作者簡介]韓水法（1958—），男，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人，1978—198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獲學士與碩士學位，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哲學博士學位，1988年至今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2011年度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從事德國哲學、政治哲學、社會理論和當代中國思想研究，代表著作有《康德物自身學說研究》、《大學與學術》、《正義的視野——政治哲學與中國社會》，譯著有《實踐理性批判》（[德]康德）、《社會科學方法論》（[德]馬克斯·韋伯）、《民主與資本主義》（[美]鮑爾斯、金蒂斯）。

Title: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nception, Method and Perspective - EU as Mirror

Abstract: The solidarity of East Asia, or its possible integration, and eve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on in the future, could not place hope on just spontaneous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but should rely on the self-

consciousness and autonomous efforts of the people and politician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EU and other various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East Asia region, not only provide rich experience, but also offer a variety of possible ways and means for the solidarity of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as well as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consult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East Asian integration consists in facing the past history, historical tid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fully and independently, in addition to the assumption of the present and future needs, as well as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which have to be taken in joint effort. East Asian Community, if it is possible,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ivilization circles of the world, and constitute the core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together with the EU, the US and possibly other systems or communities of nations, meanwhile forming a civilization region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Therefore, it bears responsibility for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ulti-civilization for human. Viewing from the cooperation, transition and prospects of East Asia,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obstacles caused by them are easy to have change, while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behavior infiltrating in people's daily lifestyles and attitudes plays a decisive role. Therefore under the premise of reaching the agreement to the maximum extent, maintain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societies and cultures of different nations is the key point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Keywords: East Asia, consensus, community, EU, mirror

Author: Han Shuifa received his PhD in Philosophy from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was appointed as the "2011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Changjiang Scholars Program"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Currently Dr. Han is the Professor and the doctoral tut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studies of German philosophy, political philosophy, soci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s.

一、“東亞”的概念：歷史與現代

(一) 東亞人的關係與人類的一般關係

討論東亞的關係，無疑需要把歐盟作為比較和對照的樣板，同時也需要從東亞各國之間的關係來理解歐盟的內在關係和意義；但這裏要強調的是，這種關係首先是人類之間的一般關係。人類的關係從不同學科以及特定學科的不同角度來進行研究，就會呈現不同的意義，產生不同的主題；然而，無論出於什麼學科、什麼角度，人類的一般關係始終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和根本的背景。這也是東亞各國之間的關係之所以能夠與歐盟的關係進行比較，或者說歐盟的經驗能夠為東亞各國的關係提供借鑒的前提。除了人類的各種共性之外，這些前提自然包含現代人類共同的積極價值，諸如人權、民主、法治等，諸如選擇、興趣、利益考量等人類的合理性傾向。它同樣也會關涉處理國際關係的一般手段，如談判、協商、角力、競爭、國際法，乃至管制、制裁、武力威脅、干預、戰爭等等。於是，這種一般的人類關係與東亞具體的歷史、現實、社會結構、觀念結構乃至生活方式的結合，就產生了東亞各國關係的獨特性。這些獨特性，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考慮。

其一，就人類共同價值而言，不同的國家不僅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落實形式以及實現的不同的時間進程，而且這種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形式和進程還造就了共同價值的特殊的實現形式。從表面上看，東亞各國之間在基本價值觀念和基本政治制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異，但它們之間的共存和合作又是不可避免的。這構成了今日東亞的現實。正因為如此，在東亞許多人眼裏，一般的人類關係就成為了國家與國家、族類與族類以及不同政治制度之間的具體而特殊的關係。這樣的見解，很容易使人們的眼界趨於片面而陷於現實的困境，從而無法看見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尤其是積極的可能性。實際上，東亞各國多數民眾在對人類基本價值和觀念的理解和接受方面，越來越趨於共同（除了朝鮮這樣的特殊國家之外，這是一個顯然可以驗證的趨勢）。因此，理解特殊性的關鍵在於，從何種角度、



何種層面來考察基本觀念？官方的意識形態與民衆的主流價值觀念是兩種不同的觀念存在，雖然可能相容，但常常並不一致。誠然，由於這種局限，基本觀念在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體現。

其二，東亞特殊的歷史，尤其是現代的殖民和侵略的歷史，造成了東亞各國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轉變、現代化進程的挫折、複雜的現實局面和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形成了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民族的、經濟的、社會的乃至品位的多重實際障礙，它妨礙人們理解、達成、落實共同的價值，把握和實現共同的利益。因為這些特殊的關係、現實和歷史記憶在一般人的理智裏（或者說，在人們的常識裏），似乎更貼近人們對利益的日常考量和表層情感，因此，也就更容易為政治家和特定的利益集團出於他們的現實政治利益和其他目的而操弄。

其三，人類的價值共識始終是通過具體而各不相同的道路和方式達成的，而共同價值也是通過不同的制度和措施落實的。同時，這種途徑和方式的特殊性又並非是預先明示着的，而是要通過人們實際的社會、經濟、政治活動，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間的競爭和角逐而實現的，其間會由於政治力量和外在形勢的風雲際會而向各種不同方向發展，因此具有不可預測性。而在現代社會，這些價值的落實也並非僅僅屬於某一特定國家、特定民衆自己的事情——抽象地說，它同時也是人類共同的事業；具體地說，這些價值的落實也依賴於國際合作。

無疑，這三方面的獨特性，讓我們理解到實際關係的複雜性和偶然性，需要我們以審慎的態度來分析各種關係，並且從中發現主流的或決定性的因素以及它們能夠發揮作用的條件和空間。而這樣的成果，無疑有助於人們在實際的政治判斷中做出合理的決策並採取相應的措施。

（二）共同性與差異性

“東亞”是一個現代概念。這裏所說的“東亞”，主要指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和蒙古。這樣一個區域也被一些學者稱為“東北亞”，但由於“東北亞”在現在的習慣用法中還包括俄羅斯的部分亞洲地區，而本文的討論並不包含這個區域。另外，在一些研究文獻中，“東亞”主要被用來指中、日、韓加東南亞十一國^①，但這一用法中的“東亞”區域邊界是模糊的，而本文中的“東亞”概念既指定了明確的區域，也包含這個區域的

緊密關聯有其深厚和長久的歷史根據——儘管它的現狀使得今天許多人刻意迴避它歷史上的實際關係。

“東亞”作為一個中性的地理概念從表面上看指示了某種共同性，然而當人們深入涉及這一地區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或進一步涉及這個地區的不同民衆的狀況時，就會發現，這一概念所包含的差異性要遠遠大於共同性。

事實上，在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很少用“



① 郭定平主編：《東亞共同體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第7頁。

東亞”來指稱自己所處的這個地區，更不用說用它來指稱居住在此的自己的族類和其他族類。若干調查資料表明，東亞各國民衆之間的好感遠遜於歐洲和北美國家的民衆對東亞各國民衆的好感。比如，日本人對中國人的不喜歡程度遠高於美國人、英國人對中國人的不喜歡程度。^①這樣，“東亞”就成了一個純粹的地理位置了。不僅如此，由於日本的現代化是以“脫亞入歐”為目標的（即便在今天的世界政治地圖上，日本也屬於西方而不是東方），因此，當我們現在來談論東亞的未來而着眼於它的共同性時，首先不得不面對的就是這個概念的消極層面和意義，從而陷於尷尬的境地。

然而，為了使討論能夠順利地進行，使問題得以清楚地展現出來，直面這種尷尬和困境就是無可避免的第一步，而對理解問題的複雜性來說這也是必要的。從現實的巨大差異乃至各國民衆之間彼此的敵意之中發現共同性的因素，是本文的一項任務，而東亞的未來就其積極的方向來說就是奠定在這種現實的和可能的共同性之上的。

現代學術既有的各個門類和領域為我們提供了分析共同性的許多現成的入手處和途徑。比如，歷史的視野，過去、現在、未來的時段劃分；政治、經濟、社會、民族、語言、習俗等領域；區域、文化傳播、歷史恩怨等關係。對這些領域的分別考察，可能會得到許多相互矛盾的結論。即便從今天的狀況來看，東亞各國以及人民之間的密切聯繫和交流，尤其是彼此高度的經濟依賴與密切的人員往來，與若干調查所獲得的好惡情感的比率之間仍然形成很大的反差。這種彼此矛盾的現象應當如何來解釋？不同的觀點、方法、視野和態度會帶來不同的結論。

東亞歷史上共同文化的某些部分儘管今天仍有遺存，如儒家思想、佛教、漢字以及傳統的節日系統、日常生活方式等，但在不同的國家狀況各有不同。在日本，漢字依然是實用的工具（當然，已日益削弱），而在韓國、越南，它已經成了歷史的記憶，或者追溯歷史記憶的工具了。然而，這些共同的文明因素的留存方式是在現實之中，還是在歷史之中，或者僅僅在歷史記憶之中，則是需要認真考察和研究的。若干曾經以儒家思想為基本觀念的國家或者信奉了馬列主義，或者幾乎成為了基督教國家，從而都皈依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

即便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共同性，甚至在基本觀念和制度方面的共同性，當它們落實在人的具體社會行為以及具體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之中時，也會出現千變萬化的差異，更何況不同國家和族類原本擁有自己的觀念、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而這些因素就會使移植過去的即使作為基本觀念接受的思想本土化。而這就意謂着，這些共同性即使在那個已消逝的過去，也包含許多具體的差別。當今天的人們為了尋求合作、共同利益與和平時，那些曾經的或尚有遺存的共同性就會發揮積極的作用，甚至以特定的方式起主導作用；但當人們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由於各種原因陷入衝突和對抗時，各個國家或族類之間的差異性就會起主導作用。更有甚者，當兩個或若干國家或民衆處於合作的蜜月期或因各種原因而相互示好時，這種共同性就會被放大；反之，雙方處於衝突或對抗的狀態時，差異性就會被放大。雖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猶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要從人之常情的角度來理解，但是準確地把握這一情勢則有助於瞭解共同性與差異性的變化，從而準確地理解東亞各個國家或民衆的現實關係。

此外，當我們在此討論東亞各國的共同性與差異性時，還要考慮一個尤為重要的條件：在當今世界上，在現代化進程中，東亞國家或民衆之間的關係還受到西方因素——準確地說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的重要影響和世界體系的制約。由於日本、韓國與北美、

^① “24-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Pew Research Center, 2008), 35 (<http://www.pewresearch.org>) .



歐洲諸國在政治上具有共同的認同，如今這兩國民衆在情感上與西方國家的民衆更有親近感。當東亞國家和民衆的獨立、自主意識增強而成爲主流時，他們在強調自身的自主、自尊並因而反思與西方國家及其民衆的區別時，其獨特性、獨立性、自主性就會成爲突出的問題；而當他們面臨東亞各國或民衆之間的持久的複雜衝突，尤其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和歷史恩怨的反復糾纏時，一些國家的民衆更願意從西方國家民衆那裏尋求更大的共同性，他們的認同就會簡單地跳出東亞這個範圍，從而尋求自身自主性的其他定義。因此，就這一點而論，東亞國家和民衆又分別處於不同的政治地理區域；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他們具有選擇其他區域認同的可能性和條件。

但是，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卻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恢復了東亞國家或民衆之間的天然聯繫。東亞各國之間越來越緊密的經濟聯繫，不僅使得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樊籬上撕開的口子越來越大，而且也在持續地沖刷歷史恩怨的心理堤岸。尤其是經濟上密切聯繫帶來的人員之間的頻繁往來造成了彼此之間的新型的相互影響——文化的尤其是生活方式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日流”，“韓流”），乃至宗教上的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似乎在重複歷史共同性的某些形成過程，但卻是以相反的方向，而且直接通過開放的、民間的途徑。對這種相互的影響，乃至一定範圍的融合（譬如，各國民衆之間的日益增長的跨國婚姻，尤其是中國與日本、韓國之間的跨國婚姻），人們通常會予以輕視，而主要關注那些衝突的事件，就像現代媒體定勢以及它們所欲造成的結果那樣；但理性的思考和有效的理論研究則無法忽視這樣的趨勢和現象，而是必須予以十分的關注。

上述這些共同性和差異都是確實存在的，而且在現實中遠比理論上來得具體和生動，因此，無論衝突和融合都顯得更加鮮明。從表面上看，人們所見及的常常是彼此矛盾的現象，比如中日民衆之間情感對立的日趨惡化與中日之間跨國婚姻的日趨增長，以及中國留日學生數量的持續增長。當我們討論東亞的未來時，至關重要的立場就是如何來面對、分析和研究各種經驗現象的因果關係，各種潮流之中的主流。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關涉洞察力和方法：一方面，民衆情緒通常是各種差異最具體的和現實的表達，它們能夠放大各種差異，直至導致大規模的衝突和對立的局面；而在另一方面，正是民衆的實際考慮和行爲又形成了超越這些差異的最主要的和現實的力量。無論是經濟行爲，還是人員交往乃至移民，都以巨大的力量來突破這些差異的局限，通過建立新的、具體而微的聯繫而達成某些新的共同性。

（三）歷史與歷史記憶

無論理論解釋、民衆的實際行爲甚至刻意宣傳如何，歷史事件和民衆的歷史記憶作爲一個基本的但通常是隱伏的背景，在今日東亞國家或民衆之間的關係中，始終是一項伺機而起的重要而活躍的因素。這些歷史事件和記憶雖然不會自動發揮作用，卻很容易爲東亞不同國家之間和民衆之間的現實衝突所激發。同時，政治家們或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團也經常會操弄這些歷史事件和歷史記憶而爲自己的利益和目的服務。與密切的經濟依賴和人員往來這樣一些事件相比，甚至與潛移默化的、日常而具體的生活方式的影響相比，歷史事件和記憶的某些因素如侵略、殖民、屠殺以其簡明的印象和概念直接訴諸人們的情感，從而是一種更容易發動和操弄以造就對立擴大差異性的因素。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的現代化進程，激發了它原先潛伏的各種自大的觀念和欲望，如以自己爲中心，擴張的衝動，以及迅速崛起而導致的鄙薄東亞其他國家和民衆的暴發戶心態和氣勢。在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行爲、理論的教育、示範、鼓勵、合作的情況之下，日本侵略和殖民整個東亞地區，並進而侵略整個亞洲。日本社會的領導力量和精英階層固然爲這種侵略和殖民製造了許多理由，包括冠冕堂皇的亞洲獨立和東亞聯盟的

藉口。在直接的佔領、屠殺、掠奪的現實面前，這種藉口的自欺欺人是不言而喻的；更何況，還有無法抹煞的當時日本精英所公開表達的征服中國和亞洲的願望、計劃和目標。日本的侵略對東亞乃至整個亞洲造成了極為深重的災難性後果。它打斷了東亞尤其是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進程，包括走向憲政的進程，進而中斷了亞洲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由此，日本摧毀了東亞已經大體形成的國際秩序和力量對比，從而促成西方帝國主義更加深入地介入、干預和殖民東亞和整個亞洲，尤其大大地有利於蘇聯在東亞和整個亞洲擴張它的勢力範圍，埋下了此後許多災難性事件的禍根。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期間，從整體上來說，日本對整個東亞地區的現代化轉型和憲政秩序的建立所發揮的基本上都是消極作用。時至今日，日本精英階層（包括知識分子），一直對此缺乏深刻的反省；而實際上，即便受害國家的人們對此也同樣缺乏足夠的認識和理解，而僅僅將這種消極影響理解為當時的侵略行爲，包括屠殺、侮辱、掠奪和破壞。

日本歸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使得日本（包括精英階層和民衆）卸去了對這種歷史罪行進行反思和檢討的外在壓力和理由，並且日本的民主化以及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包括佔領和賠償），又使日本政府和民衆免除至少削弱了對其長期的侵略和野蠻戰爭的道義責任。

而亞洲其他國家囿於各自的現實利益、陣營歸屬、意識形態和眼界等原因，譬如蘇式制度在中國的推行，對此同樣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尤為關鍵的是，受害最烈、被禍最深的中國，反思卻最淺，不僅多數民衆僅僅停留在簡單的恩仇怨恨的情感層面，而且精英階層也缺乏宏觀的眼光，學術界也缺乏全面、綜合、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這就使得中國社會既無法全面、客觀、合理地認識和理解現代歷史上這些重大事件的因果關係、歷史後果和深遠影響，也無法使中國民衆求得從這種歷史記憶和深重後果之中走出來的合理而正確的途徑；自然，也難以獲得走出這種由雙重的歷史效果造就的消極情緒的正當理由。

東亞各國之間圍繞歷史事件和歷史記憶而形成的複雜政治、社會和情感的局面，有多重原因，而如下幾個方面無疑是主要的：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國家的現實政治態度，二是以意識形態衝突和“冷戰”為主要內容的兩大陣營的對立，三是東亞各國和地區的自主性缺乏和相對落後。這些因素，嚴重地妨礙東亞以及亞洲各國之間通過合作建立和拓展彼此之間的共識和信任，包括對歷史事件的事實認定和性質判斷。

即便從今天的立場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民主化以及它進入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陣營這個事實並不能夠抹煞日本歷史上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和所應當承擔的道義和法律責任，當然也不能夠抹煞它曾經起的破壞作用，就如同德國的戰後民主化並不能夠抹煞納粹的罪行和戰爭責任一樣，它現在對歐洲的貢獻也不能抹煞它對歐洲曾經造成的破壞。而這一點，正是許多人沒有清楚區分的。在西方世界，許多人更願意從現在的親近感來判斷歷史事件。這是諸多導致歷史誤解原因中的重要的一個。

與此緊密相關的另一點是，對許多歷史上受害的國家和人民來說，日本的歷史罪責和各種責任雖然無法由它的自由民主化而得以消除，但也不能由此推斷自由民主沒有導致日本的改變，更不能進一步得出要拒絕自由民主的制度和價值的結論。

（四）心態

現代國際關係的大綱雖然是經濟、政治和法律關係，但每個國家民衆的心態^①不僅在

^① 這裏所謂的心態，主要指人們的精神狀況、態度和意見。



通常情況下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政治、經濟的決策，而且在關鍵時刻直接爆發出巨大的力量，而其一時發作所造成的社會後果的影響則通常要持續相當長的時間。民衆的心態，或準確地說，圍繞國與國關係的民衆心態雖然在短時期內會出現較大的波動，在長時期內是穩定的；但是，短期的波動不僅會使民衆本身的態度趨於偏頗，也會導致決策者的判斷失誤，做出情緒化的、短視的、錯誤的決定，從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使得國家之間的關係受到重大的影響而發生改變。倘若這種情況持續，那麼原本暫時的心態也就會漸漸地成為持久的心態。誠然，這種情況在那些缺乏政治共識和共同的基本觀念的國家之間最容易出現，但即便在那些價值層面具有高度共識的國家、共同體之間或者內部，由於利益的衝突——甚至表面上的利益衝突，語言文化和習慣的差異，加之歷史的因素——甚至是變異的歷史記憶，也會導致共同體內不同民衆或族類的心態的波動，從而導致諸如分離主義的要求與運動，比如歷史悠久的魁北克的獨立運動，以及近來漸成勢力的蘇格蘭分離運動——而今天蘇格蘭地區的多數民衆可能與歷史上的蘇格蘭人沒有多少關係。

日本、韓國以及中國的臺灣、香港等地區，在現代經濟、社會、政治上的成就率先樹立了東亞各國民衆對自己族類、社會和個人的自信心，同時建立了現代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基本原則，並為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樹立了榜樣。這個現象對東亞乃至整個亞洲具有巨大的社會心理影響和意義。但這種心理意義並非是一維的，而是多維的，並在不同的關聯中會產生相當不同的效應。

1924年，孫中山在日本的神戶所做的《大亞洲主義》講演中指出，日本的崛起、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戰勝俄國曾經使亞洲各國民衆生發了一個大希望，即可以以之為榜樣而達到自身的獨立。但是，日本當時對東亞和亞洲各國的所作所為又使孫中山不得不直接對日本發出這樣的警告：“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①這個警告也具有一般性，它是針對所有國家的警告，包含正面的和反面的雙重意義——既告誡已行霸道的日本，也警告可能受霸道之害的中國和其他國家。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就非常有效地仿效了當時西方國家通行的雙重標準：對本國人民是一種標準，對其他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和弱小國家採取另一種標準。在19、20世紀之交的東亞所存在的這種複雜的心態，是理解東亞各國關係的一把鑰匙。同樣，它也有助於人們理解今天東亞各國民衆心態的複雜性。

這種心態當然是過去的歷史、歷史記憶和現實狀態的複合體。在今日東亞，能夠合理地思考的每個人都會針對不同的關係而持不同的態度和判斷，要他們採取一個一般的態度來對待所有事情是相當困難的。倘若東亞各國民衆對彼此之間的關係具有更多的知識，他們的心態就會變得更為複雜。這種複雜性其實也同樣困擾社會精英階層。對學術研究來說，這也許是一個寶藏——越是複雜的現象就越有研究的價值；而對行為的決定和政治的決策來說，這無疑是一種莫大的困難。與今日相比，在孫中山發表那篇著名講演的時代，從民衆到精英階層，祇是少數人纔具有這樣複雜的心態，以及相應的複雜思考。

具體論及曾經擁有的共同文化，東亞各國民衆的心態十分不同，情況不同而互有交錯。比如，日本政府廢除了所有從中國獲得的曆法、節日系統（在偏僻的農村地區，人們曾經通過抗爭保留了幾十年），但部分保留了漢字，以及從中國傳過去的生活方式，包括飲食方式、服飾方式等；不過，今天也開始趨於式微。韓國和朝鮮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廢

^① 《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1卷，第409頁。

除了漢字，但保留了來自中國的主要的節日系統；不過，韓國民眾傾向於把這些至今有價值的東西視為本民族的東西，從而與中國的淵源分離開來。然而，傳統文化在中國本土上遭到了最為嚴重的摧毀。中國縣以上城市除個別之外，傳統的建築和街道基本上消失了；而按照中國行政區劃，市（地區）以上的城市的傳統城區格局和建築，除了北京等個別城市有少部分殘留外，幾乎蕩然無存。如今，傳統節日系統在勉強的恢復中，但其意義類似於新酒裝舊瓶。這裏生發出的一個問題是，既然各個國家及民眾與傳統的關係都日漸疏離和淡薄，那麼傳統、歷史事件和歷史記憶在今天對民眾心態究竟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就東亞各國或民眾之間關係而論，究竟歷史的什麼部分纔是人們最為關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究竟是歷史的哪些事件最能夠觸動民眾的情緒？上述兩個問題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相類似的，其實有很大的差異。對理解民眾的心態以及東亞各國之間的關係而言，前一個是更為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提示我們，所有存在於國家或民眾之間的歷史問題的效應，最終都取決於現實的關係。克羅齊（B. Croce, 1866—1952）“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挪用在這裏應是頗為恰當的。

在這裏，我祇能粗略地勾畫一下東亞若干國家的民眾心態——這很可能是有爭議的。

人們應當予以深切的理解的一點是，在東亞所有國家中，甚至在全世界，當代中國民眾的心態是最為複雜的。即便僅就如何看待東亞歷史而論，情況也是如此。它可以概括為如下兩個特徵：一是對歷史和傳統文化的驕傲與鄙薄兼具的矛盾心理。這無疑導致民眾意見的分歧，雖然近來對歷史和傳統持積極態度的人數漸趨增多。二是對現代歷史的屈辱、自卑和不服。儘管今日中國民眾的心態是相當複雜和混合的，但從總體上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趨向於理性和合理化的。這也是中國社會依然持續進步的基本動力，是中國取得成就的社會基礎。隨着現代網絡技術的發展，諸如微信一類的手段，使得中國民眾擁有了更大的公共微空間，中國民眾的心態在這裏可以得到比較真實的呈現。無疑，在這裏也可以看到種種實際的分歧和衝突。

日本民眾對歷史的心態同樣也是複雜的。作為一個現代的自由民主社會，不同的觀點都有公開表達的可能性——儘管這不意謂着所有的意見都表達了出來。但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相對於東亞各國所取得的成就而形成的優越感和相應的對其他國家的歧視，依然是多數民眾的心態——儘管在民主社會裏，它難以那樣大張旗鼓地公開表達出來，但它依然會體現在交往的行為之中，並在非公開的場合裏表達出來。比如，在社會調查和統計時表達出來。迴避不良的歷史記錄，雖然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沒有人會把自己的罪行和錯誤經常掛在嘴邊。一個民族的大眾心理也是如此。或許，人們也可以同情地理解，對現在日本的多數民眾來說，他們的前輩在中國以及東亞其他國家所做過的事情乃是不可承受的歷史，有辱他們現在的良知和道德，因而並不願意直面它。然而，日本侵華的行徑過於野蠻，而自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的干涉、侵略、瓜分的計劃和行為，對現代中國所造成的巨大損害，日本政府的措辭是極其保留的，僅限於“深刻的反省”，並沒有承認罪責。中國政府免除日本的戰爭賠款等責任，以及由於中國後來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又給日本政府和民眾提供了迴避戰爭責任的似乎更強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理由。尤其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中，由於中國決策層在處理相關問題時缺乏符合現代世界行為規範的經驗和藝術，一方面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接受了日本的“深刻的反省”這樣一種輕描淡寫的表達，並免除了日本政府的戰爭賠償等責任；另一方面，在彼此的交往中又不斷地反復提起日本的這一段歷史，試圖作為一種理由獲得心理上的優勢。這就給某些日本人反駁中國提供了口實：既然當時中國政府在正式聲明中接受了那樣的表達，為什麼現在又指責日本沒有道歉和



謝罪？最為重要的疏漏是，1972年中日建交時的這些重大決策不是在大範圍內醞釀，不是根據民衆的意願做出的。因此，政府的行為與民衆的要求和心態之間存在着相當大的落差。

這裏談心態，談民衆的心態，或許有人會質疑，心態有這麼重要的意義嗎？事實上，重大的歷史事件，國家之間的重大行為，都與民衆心態有直接的關係；而在社會各種問題、矛盾和衝突交集而湧現的時期，或處於動蕩、危機時期，心態更是造成巨大事件突發的主要力量。這裏不必提及德國20世紀前三十年的民衆心態與德國政治走向之間的關係，以及與鄰國關係變遷中德國民衆心態所發揮的作用，也不必提及當時韋伯（M. K. E. Weber, 1864—1920）對這一情形的認識以及要求德國民衆忍耐的告誡。這裏祇需要說的是，現代民主以及相應的制度，乃是罩在民衆心靈上的一層外殼。這層外殼的硬度雖然取決於多種因素，但是民衆的心態無論如何是一種決定性的因素。即便在歐洲、美國，在自由民主的外殼之下，民衆的一些真實的心態一直潛伏着，無意識地存在着，一旦因應時勢被啓動而流露出來，都要體現為某種政治勢力和力量。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的勝利，就表明自由民主的外殼遠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的堅固。因此，我們在充分肯定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時候，也要思考這層外殼如何能夠得到合理的和積極的維護。

韓國民衆對中國、日本都抱有相當複雜的心態。中國傳統文化曾對韓國（朝鮮）文化產生過重大影響，但在两千多年的歷史上也曾對韓國發動過戰爭並控制過韓國，而韓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是中國的藩屬國。日本則在近代長期控制、侵略和吞併韓國。韓國的現代化成功和經濟的成功，展現了韓國人民巨大的創造性能力；尤其他們先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以及現在良好的社會秩序，民衆在國際上的正面形象，相對於過去的歷史，都使韓國民衆具有別樣的自豪感。歷史上的從屬地位和被侵略被殖民的經歷，以及曾經的落後，與今天的成就結合在一起，塑造了現代韓國民衆的另一種複雜的心態。這一點從他們對中國、日本的好感都遜於對歐洲國家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雖然在中國的北京、青島等地存在幾個巨大的韓國人居住區，但這一時還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韓國民衆對中國的心態。韓國民衆對日本的心態也有同樣的情形。相對於中國民衆對日本的心態，韓國民衆認為日本對侵略戰爭的道歉不夠的人數要遠高於中國民衆。^①

二、歐洲、歐盟與中國

（一）歐洲形象的雙重性

歐洲和西方其他國家是東亞和整個亞洲現代變遷中一股始終存在的重要力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甚至還是決定性的力量。有關東亞未來的討論，自然包含與歐洲和西方其他國家的關係。不過，這裏的重點將放在歐洲，尤其是歐盟對於東亞的借鑒意義乃至榜樣的效果。

歐洲以及一般所謂的西方概念在中國民衆心裏至少具有雙重的意義；而對日本和韓國來說是否也有這樣的情形，尚需作進一步研究。

英國等歐洲國家為了單純的利益突破了閉關鎖國的中國，在侵略、掠奪、瓜分中國並進行殖民的同時，也強行將中國拖入現代化的進程，進入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直到現在，這種歷史事實和歷史記憶依然是中國民衆觀察和理解西方世界的一個重要背景，一個經常被選擇的角度，甚至就是一種方法。尤為重要的一點是，西方世界迄今也沒有完全

^① 韓國民衆96%認為道歉不夠，中國民衆76%認為道歉不夠，而日本民衆41%認為道歉不夠，42%認為足夠了〔“24-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Pew Research Center, 2008) , 49 (<http://www.pewresearch.org>) 〕。

摒棄雙重標準的行為準則，而這無疑會深化上述的歷史記憶。這種歷史記憶通常會與日本侵華的歷史記憶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政治地理上的西方概念。無疑，在日本、韓國，這樣的背景即便存在，也要淡薄得多。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尤其歐盟的建立和擴展為世界樹立了一個新的、良好的典範。這就是，那些互為世仇、彼此之間進行了上千年戰爭的國家之間達成了和平合作意願，並進而統一起來，形成了一個新型的政治共同體，歐洲政治、經濟和社會由此而獲得了全面的進步，為那些具有複雜歷史、曾經敵對的同一區域的國家之間的合作以及一體化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和榜樣。

（二）歐盟的經驗

歐盟的經驗對於東亞的未來發展和合作具有多重的意義。

其一，歐盟的進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英、美、法等國佔領並徹底改造德國與德國承擔戰爭的全部道義責任、物質責任的前提之下開始的。這種改造，為原先敵對的各國之間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聯合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基礎，包括各國民眾對立、仇恨心態的緩和和平。即使最初的煤鋼聯盟得以成立的條件也不僅僅包括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即實行自由民主的制度），還包括不同民眾之間心態的平和與諒解。

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雖然美國自然而然地成為西歐和整個西方世界的領袖，但歐洲是現代文明的肇始和發源之地。在西歐人看來，美國文明無非是自己的文明在另一個地域的擴展，至多是同一文明體系的新疆域。美國人也認為自己屬於歐洲文明的範疇。即使僅僅就當時歐洲的範圍來說，歐盟創始各國事實上具備高度的文明認同。就這個區域而論，存在着這樣一個重要的心態氛圍：西歐各國民眾並不認為存在着比他們的文明更優秀的文明體系，也不認為存在着比他們的制度——儘管每個國家的制度之間還有形形色色的差異——更合理或更進步的制度。這樣的意識就確保了他們在文明、制度和其他領域的自主性和自信心。雖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西歐的政治、國家關係和軍事等處在美國的支配之下，但這僅僅關涉政治和軍事的領導權，而不牽涉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國家之間政治制度之間的差異。

其三，歐盟的發端是從那些關係十分密切的國家開始的。這裏所謂的密切，包含複雜的內容，既包括長期的敵對和征伐，也包括共同的歷史、文化和宗教，尤其包括經濟上的互補。經濟合作是歐盟的原動力。

其四，歐盟各國，尤其是最初的發起國，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一直採用和堅持雙重標準。它們在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同盟之內實行一套原則和標準，而在其殖民地或對其他在政治、宗教、文化、經濟等方面非同類的國家則實行另一套原則和標準。毫無疑問，它們對這一沿習千年的傳統予以發揚光大，而在具體的內容和手法上則有變化和進步。當人們從歐盟之外的立場來考慮歐盟的經驗和榜樣的作用時，這一因素的作用和意義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雙重標準一方面固然是對同盟之外的國家的歧視，但它卻會有效地增加同盟內部成員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土耳其至今未被歐盟接納為成員國，就是觀



歐盟成員國示意圖



察這種雙重標準存在以及強弱的一個重要參照。與此相似，前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已經加入歐盟，而以波什尼亞克族（即原南斯拉夫時期的穆斯林族）和塞爾維亞族人口為主的波黑則至今未被接納入歐盟。^①

其五，民族國家在歐洲是近代以來纔出現的政治共同體。西歐各個國家以及彼此之間的國界是在近現代通過貿易、宗教、革命和戰爭等途徑初步奠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體形成，而到20世紀末纔最終確定。與歐洲相比，東亞，尤其是中國，是一個相當早熟的現代國家，雖然它的許多形式與西方那些後來居上的現代國家相比，發展得並不充分。因此，在東亞，各個國家之間的邊界在近千年的歷史中是大抵明確的，這與歐洲的歷史有巨大的差別。在第二次世界戰之前，“國家”一類政治共同體的興起和消亡是經常的現象，甚至到今天，這樣的現象似乎還有發生的可能。經過兩千多年的興亡，歐洲國家的疆域和範圍纔大致確定下來。歐盟的核心國家，亦即西歐的主要國家，通過一次最後的戰爭，彼此無意識地合力將自身都打造成了民主國家，從而在制度上面達成了一致性。這種一致性至少在今天是保證歐洲各個國家之間邊界和相互關係穩定性的首要條件，同時也是使得這些邊界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的基本條件——這一點對東亞各國是有重要的啓示意義的。

其六，歐盟雖然確立了各成員國的共同的價值觀念、內在一致的基本法律體系以及其他原則，奠定了和平發展的基礎，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歐盟各成員國之間只有合作沒有競爭。事實上，在經濟、文化、社會諸方面，歐盟各國之間不僅存在差異，也存在不小的競爭。這種競爭不僅體現在歐盟各成員國之間，也體現在歐盟內部各種思潮和政治力量之間——2014年歐盟議會選舉的結果就表明了這樣的現實。

（三）東亞、歐盟與現代國際關係

現代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和理論都是西方人根據西方國家之間關係的長期演變情形逐步制訂出來的，雖然有其悠久的淵源，但也主要適應歐洲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在運用於東亞各國之間以及它們與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時常常會捉襟見肘。其實，對世界其他地區國家之間的關係來說，也常常是水土不服的。就現代學術而言，措置東亞的歷史及其歷史上國家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和闡述手段，其實是相當缺乏的。即便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一般地適用於東亞國家之間的關係，但是這種國家關係也要無可避免地牽涉歷史的問題，在今天造成東亞國家之間衝突的主要因素都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而現代國際關係理論對這些問題鞭長莫及。

所以，東亞的未來，無論是走向哪個方向——是通過經濟的一體化而逐漸達成政治的一體化，甚至東亞共同體的建立；還是始終保持現狀，或者走向相反的道路，東亞各國分別同區域以外的國家建立不同的同盟，東亞地區出現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同盟；或聯盟對孤立的國家，等等，它都是一個構建國際關係新範式和新理論的過程。就此而論，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古代東亞擁有它自身的獨特的共同體，這就是所謂的“朝貢體系”。在這個體系裏，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處於中心地位；即便在中國失去中心地位的時期，也並沒有其他的中心出現過——儘管確實也有其他國家曾經懷有成為中心的志向。在這個體系內，東亞各個成員國都接受儒家觀念，因而成為核心成員。就此而言，儒家文化與“朝貢體系”是相互重疊的，但“朝貢體系”遠遠超越儒家文化圈子。“朝貢體系”同時也表示一種等級關係，因而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在今天並不願意多提起這樣的關係——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① 在南斯拉夫分裂戰爭期間，歐盟國家有選擇地支持特定族類的種族驅逐和清洗，而打擊其他族類的種族驅逐和清洗。

但它也表明，這種歷史關係在東亞各國民衆的心裏並非都是正面的。作為一種歷史記憶，在當代世界，它潛伏在複合的心態之中，不會自主地發揮作用，雖然它確實擁有發揮重要作用的潛力。

歐盟，或者可設想的北美聯合，以及其他地區的諸國家共同體，對東亞的現在和未來提出了諸多的挑戰和問題。比如，東亞各國家之間在當代是否依然具有親和性，甚至親和的基礎？在世界其他地區都走向區域聯合和結盟時，東亞是否依然要保持現狀？即在政治、社會、心態等層面彼此疏離，在經濟領域則相互利用，在文化方面通過民間的渠道而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但其方向通常是由自由民主國家到非自由民主國家。從現代世界的發展趨勢來看，倘若不實行一體化，東亞各國最終也會各自進入其他的聯盟或國家共同體。這也就是說，東亞或許會成為一個分裂的地區。而在這個世界上，東亞任何單獨一國都缺乏創造性地展現自己自主性的能力，在當今和未來的世界秩序、制度建設和改善上也難以發揮它們自己的創造性影響力。就此而論，從長遠看來，東亞各國都有成為西方文明的新疆域的可能性。

因此，歐洲國家的聯合並非祇是傳統歐洲統一觀念和實踐的單純復興和繼續，其實更是面對當今世界由聯合造就的多極化而做出的一種選擇——對那些參與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最優的組合。這種組合，直接成就歐盟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展的未來積極的前景；這樣的前景，通過一個單獨的國家是難以實現的。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歐盟現在越來越成為一個具有強大引力的中心，它將越來越多的國家吸引到自己的同盟之中。這種狀況持續到今天就造成了這樣一個事實，或者成為歐盟的一個成員，或者就成為一個在各個方面受到歧視、限制從而處於劣勢的孤獨的國家。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最後一場世界範圍內的戰爭，西歐的核心國家終於意識到，用戰爭這樣的手段無法解決彼此之間各種核心問題和衝突。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它們放棄了對同盟之外的其他國家使用武力。僅僅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不到三十年時間裏，它們在這個世界上（包括在歐洲領土上）已經發動了數次大規模戰爭，分裂了若干個國家，然後將它們納入自己的同盟之內。在可以預想的將來，歐盟會將自己的疆域擴展至歐洲之外的地方。這一點倘若付諸實現，那麼歷史就不是終結了，也不是簡單的循環，而是要重新開始了。

還有一點值得提及：在現代世界，西方文明依然是強勢文明；雖然存在各種其他的不確定因素，但整個世界的西方化依然是一股勢力最大的潮流。這裏存在一個關涉人類未來及其生存方式的重大問題，即人類文明究竟應當保持多樣化還是走向單一化。從現在來看，在所有其他地區中，無疑東亞諸國具備為人類創造出一種新型文明的最大的現實可能性，包括歷史、潛力和現實的各種條件，而這可以使得人類在未來不是生活在毫無差異、單調乏味的同質世界中，而是依然擁有各種可以選擇的不同文明、文化和生活方式。當然，人們也可以設想這樣一種前景，即西方文明在其未來的發展中再次通過不同形式的分裂和多中心而走向多樣化，但這不在本文研究的範圍之內。

三、“東亞”構成的意義

關於現代世界的形成，雖然各種不同的學說和理論異彩紛呈，但有一點則是相當清楚而難以否認的：現代國家以及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人們有意識、自主地建立起來的東西；越趨近今天，這個特徵越明顯。認識到這一點，具有重大的方法論和實踐意義。與之對立的觀點則認為：人類社會的所有秩序都是自發地形成的，人們並不能夠從整體上來為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更不用說一個像歐盟這樣的超級共同體）設計一套秩序並付諸實施，



因為人類社會大大小小的秩序實在太過複雜了。這種觀點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是頗有道理的：就一切新制度的構建，尤其就政治共同體的構建而論，政治實體，如美國和歐盟的政治共同體的總體構架，如美國的聯邦制和三權分立體系，如歐盟的權力機構，誠然是新構建的；但這並不妨礙其中的基本原則的若干因素、若干基本結構或其元件、局部結構，更不用說細節取自既有的制度——儘管它們也要依照基本原則進行調整。所以，在歐盟成功建立之後，“人類秩序自發生成論”在整體上已經很難立住腳了。因此，東亞的未來不能祇寄希望於時勢的自發生成和發展，而應依託於東亞各國民衆和政治家自覺和自主的努力。歐盟以及東亞區域內其他各種合作組織，不僅為東亞各國的團結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也提供了各種可能的途徑和方式。東亞未來的團結，或者可能的一體化，甚至聯盟的建立，依賴於人們主動的、有意識的營造。無論如何，東亞未來的走向和選擇從根本上來說取決於東亞核心國家如何做出選擇和決定。由於它們今天還面臨許多嚴重的困難，甚至現在看來似乎難以走出困境：各個核心國家之間還存在着政治制度的重大差異和對立；若干國家尚處於分裂狀態，包含內部的衝突的風險。於是，東亞的未來就取決於一種新型的國際關係的形成，一種全新的諸國共同體的建立。為此，如下諸點是應當予以澄清的認知。

其一，一種全新的國際關係是必不可少的：原本具有許多相同文化而現在擁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之間的合作或一體化，毫無疑問需要新的理論手段和實踐途徑。

其二，東亞的一體化或共同體應當是以東亞各國民衆的自主要求為前提的，而且也是以之為動力的。它並不僅僅出於單純的經濟利益目的，也要求在基本觀念上的認同，並承擔人類文明的使命。在原則、架構、形式等方面，它肯定會包含若干與歐盟相同或類似的東西（比如，人權、法治等原則，必要的、分立的權力機構等）；但在許多方面與歐盟會有相當大的區別（比如，組織機構等具體的制度設計等）。

其三，東亞共同體將會成為世界最主要的文明圈，與歐盟、美國以及其他可能的體系或聯盟共同構成現代世界的主要體系，同時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文明區域。因此，它負有創造性地發展人類多元化文明的責任。

其四，東亞一體化，某種國家間的共同體的建立，必定要求現在的各國的國家性質和形式做出重大改革。這種一體化或共同體會帶來某種新的框架或結構。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改革應當既是向這樣的結構的發展過程，同時又是新的結構在探索和調整中不斷形成的過程。東亞的一體化或共同體的基本動力必定是經濟的^①，但經濟合作的動力——包括民衆交往——在運行到一定階段之後，政治制度的大幅度改革，以及民衆心態的調整，就是必然的趨勢。政治制度之間的衝突，民衆心態層面的矛盾，必定會阻礙經濟動力的有效運行。雖然人們無法設想這種改革和相互調適的具體次序，但就一些最基本的觀念、原則和歷史問題達成共識則是必要的基礎。不過，這種一致性當是整個一體化進程的階段結果，既不是前提，也不是最終的目標。

其五，東亞的一體化以及自主性的意義在於：在人權、法治的原則之下，以及在各國平等、協商的基礎之上，充分獨立地面對過去的歷史、歷史聯繫和文化遺產，共同承擔現在、未來需要和應當共同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但是，在經濟、文化和其他精神領域，東亞各國之間的協作依然包含競爭——這是激發東亞人創造力的重要途徑，就如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樣。

^① 康德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世界公民權利的概念在抗拒暴力行為和戰爭方面所無從加以保障的各個民族，大自然也就通過相互的自利而把它們結合在一起。那就是與戰爭無法共處的商業精神，並且它遲早會支配每一個民族的。”〔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第127頁]

其六，這種一體化或共同體並不是要消除各國各自文明的特色，而是要盡最大可能保留這類特色。雖然東亞傳統文明相對於歐洲文明而言，原本具有更大的一致性，但即便在歷史上，東亞各國在觀念、制度、器物、建築、審美等方面依然有着相當大的區別。而自進入現代之後，各國通過各自發展的獨特路徑，尤其與不同國際體系交往的影響，使這種特色更加明顯。從世界發展進程看，祇有某種共享某些文明特徵的區域性的共同體，並且在維持一定規模的情況下，纔能保證其中具有歷史延續性的文明的獨特發展。今天德語在學術領域所受到的巨大衝擊以及邊緣化的趨勢，就是一個絕好的明證。

這裏也許會有人質疑：既然要保持各國文明的特色，為什麼還需要一體化和共同體呢？答案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在這裏我祇強調一點：現代世界是一個普遍結盟的時代。誠然，人類社會從遠古起就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結盟，而今國際關係和世界秩序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普遍結盟。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是，現代的聯盟是趨於共同體化，基本原則就是康德所說的統一的三條公共權利原則。^①“不結盟”是一個過時的做法。區域聯合和更大範圍的合作組織，已使得整個世界沒有幾個不結盟的國家了。不結盟在以前或許是弱國自我保護的一種手段，但在今天，奉行“孤立主義”的國家反而缺乏保護——既可能很瀟灑地獨立着，也可能會很悲慘地倒下。因此，東亞國家的結盟對多數本地區國家來說是必然的，關鍵在於與誰結盟？如何結盟？

東亞一體化或共同體既然是構成的，那麼這裏就可以考察一下它應當構建和不應當構建的各種理由，看看構建的理由是否充分，而不應當構建的理由是否可以消解。

首先來看有哪些積極的理由：（1）自然的而且首要的就是地理上的接壤。沒有這個因素，一體化或共同體就是一個很難提起的話題。（2）歷史上的緊密關係以及曾經擁有的共同的文明，或者文明的共同性。（3）現存的某些共同文明的遺產，某些相近的社會結構和觀念結構。（4）各國之間經濟上緊密聯繫及一體化的趨勢。（5）各國民衆之間日益密切的往來。（6）東亞環境狀況的密切關聯。（7）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的區域聯合日益增強的潮流。這七點都是相當強的理由，而其中第四、五點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趨勢，祇要沒有人爲的干預，這種趨勢祇會越來越強。

其次再看有哪些消極的理由：（1）政治制度的差異以及意識形態的不同，尤其是中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獨特性。（2）歷史問題——就情緒層面而言是一個極大的障礙，歷史記憶難以消滅。（3）民衆之間的不信任和憎惡。（4）國家規模大小之間的差異。（5）中國與韓國（朝鮮）尚未完成統一。（6）中國或日本分別與東南亞國家保持了更好的關係。在這六項中，第一項被看作是最主要的障礙，也是最難克服的障礙，被視為畏途。第二項其實持續的時間更長，甚至比第一項更難以消除，但通過政治和社會方面的調整，民衆的情緒能夠得到平息。第三項雖然體現了重要的態度，卻也與民衆之間的密切往來形成了矛盾，究竟何者是主流？第四項是歐盟所沒有遇到的情況（雖然現在歐盟也有大小懸殊的國家，但幾個核心國家是規模大體相當的），而在東亞很容易突起而成爲一種重要的障礙。至於第五項，人們甚至可以說，東亞一體化或共同體乃是解決國家分裂的一個良好的途徑。

無疑，這裏關於積極的和消極的理由的分析祇是一個初步而簡約的討論。這種理論分析祇是在指出各種促進東亞一體化或共同體的積極的與消極的力量之間的對比。理論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給出分析各種因素或理由的可能的變化的模型。但是，在現實中，這些因素如何消長，則不僅取決於民衆的活動，也取決於政治家的判斷力和決定。這裏無法思

^①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40頁及以下。



辨地斷定在現實的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中各種因素會如何演化，以及向什麼方向演化；同樣，也無法思辨地斷定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哪些因素是主要的和起決定性作用的。或者更進一步說，這裏也無法斷定，積極的原因和力量與消極的原因和力量相比較，哪一方或者哪一方的哪些因素會居於上風。這些都需要通過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纔能予以預測。

亨廷頓（S. P. Huntington, 1927—2008）在《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有兩個觀點對於理解和分析這裏所討論的東亞一體化或共同體的構成頗有幫助。第一個觀點是他在論述文明的結構時提到的“核心國家”。^①亨廷頓認為，相同文明圈內的核心國家是區域內部秩序的源泉^②，核心國家具有吸引文化上相似的國家排斥不同的國家的能力^③，核心國家具有在相同文明圈內維持、強化秩序甚至進行領導的正當性^④。亨廷頓的這個理論，從長時段和國際區域來着眼，對當時和現在的世界勢力範圍和秩序的事實具有頗大的解釋力度。不過，當各種其他的因素被引入之後，核心國家範式的意義就需要在各種實際的關係中來考察，而不會一般地有效。

展望東亞，在過去的歷史中，中國長期是當仁不讓的核心國家。^⑤無論“朝貢體系”的理論框架如何宏觀而在細節和具體關係中有多麼大的出入，中國作為核心國家是解釋這個區域國家之間關係的關鍵之一——即便對中國在東亞歷史上作用的消極評價也從反面來指明至少曾經存在這樣一個事實。無疑，歷史上形成的核心國家也會在歷史上消失，而在當代社會變遷迅速，全球化網絡越來越緊密，各種區域聯合和聯盟日益擴張的情況下，地理的鄰近已並非核心國家的一個條件。在今天，由於政治制度的巨大差異和意識形態的嚴重對立，東亞缺乏核心國家。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中國政府拒絕普世價值、憲政和公民社會，從而無法與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取得基本觀念上的共識——儘管在自由經濟和自由貿易等領域以及其他一些特定的事情上，已經達成較大的共識。核心國家在文明圈中的作用，尤其是建立秩序和維持秩序的正當性，是出於與其他國家在以基本觀念為前提之上的共同歷史與文化、社會結構、觀念結構中某些主要因素的相似，如此等等。因此，即便在後面諸項依然維持的情況之下，缺乏基本觀念的認同，核心國家的作用就無法發揮出來。近幾十年的東亞歷史相當充分地表明了這一點。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走上了自由民主化的道路，並且在一段時間內曾經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東亞的經濟具備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但是，日本由於歷史上不曾承擔過核心國家的角色——儘管在近現代它一直試圖扮演這樣的角色，卻是通過殖民、侵略來達到這一目的——缺乏歷史的依據，它沒有就現代的戰爭和破壞承擔令人信服的道義責任，缺乏正當性；同時，它一直與美國結盟而成為美國領導下的一個成員，缺乏獨立的地位。因此，日本也不可能成為核心國家。

毫無疑問，東亞需要核心國家——這可以用很多事實來說明。但是，核心國家的基本觀念和原則是必須能夠被其他國家所接受的。這裏可以分三個層次和時段來做一些分析。

一是即便在人們所謂的“朝貢”時代，或者中國獨大的時代，中國社會的核心觀念是為周圍東亞國家所普遍接受的，尤其朝鮮和日本，而且儒家思想和其他政治觀念是日本和朝鮮主動引入的，雖然時期長短不一，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在許多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別。

二是自20世紀初起，由於蘇聯對中國的全面介入，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觀念被作為普世價值輸入中國。在中國試行近三十年後遭到失敗，於是遂有中國社會的改

①②③④ [美]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周琪等譯，第141、168、167、168頁。

⑤ 中國作為核心國家是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主要的歷史的和現實的根據，也是其立論的主要基礎。參見該書第167頁、181頁及以下。



弦更張。不過，最早的挫折乃是蘇聯最終無法將中國納入它的社會主義陣營。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社會進行改革開放，其宗旨就是逐漸接受自由經濟和自由貿易的普遍觀念和原則，而正是這一原則逐漸而艱難的實施和推進所造就的效果，使中國脫離封閉體系，重新回到世界體系之中，當然也重新回到東亞的文明圈內——誠然，這祇是有限度的返回。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自主還是被動，中國經濟體系從整體上趨向於實施當代世界主流的自由經濟的原則，並建立相應的完善制度。當年，中國政府花費十五年時間的艱苦努力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其宗旨也就在於遵守自由經濟和貿易的秩序，並分享這一秩序帶來的利益。這不僅是中國能夠與世界各國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經濟合作和其他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中國經濟取得巨大進步的必由之路。但是，現代自由經濟體系從總體及根本上來說，不單單是經濟制度，同時也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會制度——它是一個複合的體系。政治原則倘若不能與經濟原則符合一致，那麼自由經濟體系必定是不完善的和不完整的，中間必定存在許多斷層和漏洞。對中國而言，政治原則與經濟原則的分離，其結果就是對內無法使自由經濟的力量充分有效地實現出來，無法使中國傳統精神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對外就無可避免地與實行自由經濟體系的主要國家處於持續的矛盾和衝突之中，從而不僅不能積極和有效地參與這個世界體系的運作以及新秩序的構建，而且也成為經常招致重大風險和高昂成本的軟肋。

事實上，在當代世界秩序及其構成方面，在基本觀念方面，中國現在依然處於邊緣地位，這使中國在東亞也無法恢復核心國家的地位；但是，其他東亞國家同樣也成不了核心國家。當東亞本地區缺乏核心國家，而現代世界卻處於結盟時代時，東亞國家就勢必要以其他地區的國家為核心國家（至少為核心力量），從而東亞的分裂——同時也就意味着東亞國家之間的掣肘、衝突和消耗——或準確地說，東亞各國各自為營的局面就會持續下去。因此，僅就東亞而言，從整體上來說，就存在着一個一個的孤獨的國家，諸如中國、日本、韓國、朝鮮、蒙古，以及孤獨的地區，如中國的臺灣等。這種彼此孤立的狀況無論從何種角度來說，祇是有利於區域之外力量強大的政治、經濟和其他聯盟。

三是今日中國有不少人試圖尋找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核心觀念之外的觀念體系，以抗衡所謂的自由、民主、憲政、法治等普世價值，或者至少替代它們。但是，這種努力存在着巨大的困難：無論何種以及如何構建起來的觀念體系，首先必須經過民衆的自由選擇，其次必須契合自由經濟的原則。^①現在有相當多的中國學者嘗試從儒家思想中獲取資源，這無疑是一種途徑，但它依然面臨民衆的選擇。無論儒家還是“國學”的回潮，都無非再現了一種歷史現象——調整性的復辟。任何一個社會在經歷了巨大的徹底摧毀傳統觀念、制度和社會結構的革命之後，經過幾十年或上百年，曾經被摧毀、禁止和破壞的社會基本觀念、制度和結構仍會慢慢恢復起來——誠然，它是以一種更新的樣式復興起來。而這種更新的樣式，在不同的國家和時代，則從近乎全部復辟到部分恢復各有不同的程度。孔子（前551—前479）所說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就包含這樣的意思，或者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不過，這裏應予注意的一點是，任何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本無助於基本觀念和普遍原則的形成——倘若一套觀念和原則是對所有中國人都適用的話，那就不可能與世界主流的基本觀念是根本衝突的。除了涉及具體的國家認同、人際關係、生活方式和語言等內容外，它們的

^①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的核心價值觀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除去一些過高的道德要求和邏輯上重複的項目外，其他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內容，其實就是普遍的基本觀念。它不僅為幾乎所有國家的憲法所承認，而且在亞洲，中國也是最早從憲法層面接受這些觀念的國家。



核心因素也應當適用於所有其他的人民。儒家的思想，尤其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中包含相當現代的因素——想一想，中國是一個早熟的現代國家，它必然包含適用於現代的因素，但是，關鍵在於如何來理解、研究和判斷中國的傳統。反過來說，真正落實諸如自由、民主、法治這些觀念以及體現這些觀念的原則和制度，祇會加強中國民衆對國家的認同，而且是理性的認同；而這種認同，同樣有助於中國取得與東亞各國在基本觀念上的共識。

除了“核心國家”外，亨廷頓的另一個觀點是“國際組織”：“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國家基礎之上的國際組織，如歐洲聯盟，遠比那些試圖超越文化的國際組織成功。”^①實際上，亨廷頓關於文明圈和核心國家理論的經典例子無非就是中華文明圈和歐洲聯盟。東亞一體化或共同體就概念上來說，並非祇是現代人的設計，而是早就存在於古人的想象之中，東亞儒家思想中的“天下”觀念首先就包含了東亞，當然，越南也在其內。所謂的“朝貢體系”，就是這種觀念的體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亨廷頓的觀點從觀念和政治實踐的歷史淵源上來說，並不是原創的，但從當代紛繁的國際關係和世界局勢中指出這些要點則確實是獨到的。

如果對這個觀點再作進一步發揮的話，那麼在理解東亞關係時，就要把敵對感與陌生感區別開來。遙遠的國家之間雖然沒有敵對的情緒或心態，但也缺乏文化共同性。在世界歷史上，具有共同文化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發生持久的敵對和戰爭是一個常見的現象——或生發於歷史宿怨（包括勢力範圍、領土歸屬、宗教派別和意識形態分歧），如雅典與斯巴達、英國與法國、德國與法國等；或生發於關係親密的國家與地區，如西德與東德、韓國與朝鮮、中國大陸與臺灣等。這種敵對（對抗或分裂）發生的原因雖然複雜，衝突起來也相當劇烈乃至殘酷，但一旦少數根本性的因素消除，就很容易達到和解，如西德與東德的統一。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尚不在本文的任務之內，但這個現象乃是理解東亞國家之間的一個關鍵之點。

四、東亞研究涉及的方法

考察世界歷史中各種政治共同體或國家之間的關係，可資利用而有影響的理論有很多。比如，以文明單元來描述世界歷史和文明興替的“湯因比理論”；以世界體系來解釋文明與國家關係的“沃勒斯坦理論”；以社會、經濟、文化為綜合體從整體來考察文明與歷史的“年鑒學派”，等等。這些理論雖然為理解東亞的過去、現在、未來提供了範式和理論手段，也在一定的範圍內有效或者頗富啟發，但皆不能完全地切中肯綮。由於歷史理論對歷史實在的依賴，所有這些源自於西方的理論都無法清楚而有說服力地解釋在世界歷史上自成體系的東亞的成因，以及它與歐洲歷史上的政治共同體或國家之間關係區別的根本所在。

僅就歷史關係而論，與歐洲各種政治共同體及國家之間有史以來的經常性戰爭這種狀況相比，東亞各國間的戰爭要少得太多——儘管20世紀中日戰爭對社會歷史的進程和人們的心態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歷史上中國與朝鮮之間也有多次戰爭。東亞各國之間並不存在宗教戰爭——儘管各國之間衝突的原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不同。中國作為一個早熟的現代國家，在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條件下建立了多種處理與周邊政治共同體或國家的衝突的機制，盡力避免訴諸武力，而“朝貢體系”在古代很長時間內提供了戰爭之外的其他解決衝突的主要手段。

^① [美]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頁。

對於“朝貢體系”，東亞學者雖然也多有考察，但作為一個理想類型或理論範式，卻首先是由美國學者費正清等提出來的。後來的許多回應和批評，包括東亞學者的貢獻，修正了這個類型或者指出了它的許多漏洞，但並沒有提出一個有效的替代範式。這就涉及多個層面的方法：首要且關鍵的一點，是如何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來理解這個理想類型所指稱的現象；其次，為了盡可能全面地理解各種現實的關聯，同一個現象可以而且應當從多種角度來考察和解釋。就此兩點而論，“朝貢體系”的範式雖然是由現代人提出來的，然而，“會”、“盟”、“朝”、“貢”、“藩”等行為卻是自古以來就存在於中華文明及其影響圈的一個事實。這個歷史事實，以及它對現代中國與東亞關係及國際關係的影響，可以從中國的角度，亦可以從其他國家的視角來考察；可以從政治共同體或國家之間的關係來考察，亦可以從政治、經濟、軍事、觀念、外交等角度來考察。人們還可以提出另外的理想類型或範式來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並將重點放在其他的層面。比如，在古代各種條件的限制之下，它是不是處理各個政治共同體或國家之間關係最為經濟的一種選擇。此外，像“朝”、“貢”、“藩”等制度和現象，當事人的想法、行為、動機與實際效果之間的關係，它們在歷史上變遷的經驗因果關係，與現代人的判斷和評價尤其是出於西方的歷史經驗、現代人的經驗的觀點，需要予以清楚的區別——這自然不是要否定它的現代意義，而是為了更清楚地梳理它的現代意義究竟在什麼方面。

以現代人的觀點來判斷和評價古代人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但以現代人的判斷和評價來決定歷史事件事實的取捨，則有礙於人們達到客觀的、準確的知識和理解，這就要求評判者的態度應當是開放的。誠然，即便在嚴肅的歷史學家那裏，也無法完全避免價值判斷介入事件的選取和敘述的方向，但客觀性和實證的可靠性依然是學術研究的原則和目標。這一點，對於理解和認識東亞古代的關係和現實的關係，尤其有其必要性和現實的意義。

比如，在東亞各國的歷史著作涉及各國之間關係的篇章中，常常可以發現如下一些共同點：（1）以西方紀年和歷史為主要參照系；尤有甚者，簡單地採用西方的社會形態的理論。（2）強調本國或有承繼關係的祖國的苦難，即受侵略和殖民等的歷史，而迴避自己國家或祖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侵略或戰爭的事實，或者輕描淡寫。（3）一方面強調和指責外族的入侵，另一方面對本族或本國開疆拓土的驕傲。這樣的心態在實際的歷史撰述——尤其是一方面要符合現代的國際準則，另一方面又要切合現實的國家利益——中確實不易處理，難以合理的平衡，但由此而迴避和抹煞歷史事實卻是有害的。（4）從現實的國家關係出發而迴避歷史上的衝突，從而不僅妨礙對歷史的準確和客觀的認識，亦反而有害於對現實的國家關係的理解和定位。現實的國家關係是歷史上多種因果關係以及現代人多重的實際行動造就的，不是某種單一因素導致的，當然也不會受它決定。

毫無疑問，方法的意義在這裏是多元的。通過各種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來考察東亞各國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結構、經濟形態、政治制度、社會心態及其彼此之間的關係，梳理出各種不同的脈絡和線索，從而確定哪些方面可能永遠都無法在東亞各國之間獲得重疊的共識，而哪些方面是能夠找到這種共識的，或者至少能在某些部分或方面達成重疊的或交叉式的共識，形成一個共識的層面。

當我們撇開理論的範式和歷史的解釋，而回到人的行為本身以及以其為基礎的國家行為上面，那麼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方法的至關重要之點就在於：交往和合作先於共識。這就是說，通過交往和合作，在既有的共同點之上達成更多的共同點，消除那些可以消除的差異，包括政治、法律、社會、心態等方面各種導致障礙的差異。實際上，人們確實是以這樣的方式行動的。就此而論，有一條原則也同樣是有效的：行動始終先於理論。



因此，付諸實踐的意志和決心是第一位的。在人類社會的演變中，在人類各種關係的建立之中，行動始終先行於有確定把握的計劃和設想，萬無一失的方案是不存在的。因此，所有理論和方法的有效性都是以這樣的實踐決心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付諸行動的決心和意志可以說是人類社會各種關係構建的元方法。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就東亞的前景而論，基本的和最可行的途徑就是經濟合作和人員交往。雖然在這個領域裏和過程中同樣存在着矛盾和衝突，但相對於政治層面的交往，它們則是更為實際的並且切近人們利益的行為，是始終自發地進行着的活動，因而容易突破矛盾和障礙。^①

從經濟和人員的交往，進入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交往和合作，東亞真正的聯合，必定要經由政治的和法律的途徑，而最終的形式就是一體化或共同體的形式。祇有這種形式，纔是東亞未來的積極前景。在這個基礎之上，討論有關東亞歷史和未來的研究和思考方法，人們就需要特別關注兩個看似對立其實是彼此相互支持的要點：共同的觀念、原則與各方的特殊性。在最大限度地達到共識的前提之下，保持不同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特殊性就是一條必由之路。共識最終必定是政治的，從而是法律的，而社會和文化的許多層面卻始終可以保持非政治的性質，保留為法律之間的自如空間。

這就關涉當代國家乃至族類之間差異的解釋理論。即便在歐盟內部，各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等方面也呈現出大有差異的形勢和局面。如何理解在歐盟各國共同的基本觀念、自由民主制度之下，以及在歐盟共同政治、法律、經濟框架與原則之下，這種差異依然存在和持續？這需要從個人的社會行為—觀念結構這個層面來解釋。在共同的政治觀念和制度之下，甚至在共同的法律制度之下，不同族類的人的社會觀念結構、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之間是存在差異的，而每個族類獨特的社會行為—觀念結構不僅會持久維持，而且也會持續發展。人們的經濟行為和生活方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受到這樣一種雙重結構的支配和影響的。社會行為—觀念結構當然會發生變化，但其進程相當緩慢。即便經歷了革命等一類巨大的社會變遷之後，它們還會在新的政治等基本制度和環境下得到相當大的恢復，但因為這個結構包含多重相互牽連的因素，它就會在不同的方向得到恢復，或者不同的因素得以放大，而某些因素得到抑制。舉例來說，德國現在的經濟狀況與歐盟其他國家經濟狀況之間的差距，就需要從社會行為—觀念結構這個層面來觀察和解釋。否則，這種差距和差異就始終是莫名其妙的。^②

這樣的方法意識對於理解和認識東亞合作和可設想的一體化或共同體具有極大的意義。中國與日本、韓國等國家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大框架上面存在巨大的差異，而在社會行為—觀念結構方面卻具有相當多的共同內容。由此，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看起來巨大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及其造成的障礙，事實上可能是相當表面的，因而是容易改變的，而浸潤在人們日常生活方式和態度中的社會行為—觀念結構看起來不那麼重要，但在社會的長期發展中卻是關鍵的因素，是起決定作用的。這一點對於理解東亞的合作、變遷和未來發展，對於東亞一體化或共同體的前景的信心，不能不說是根本性的。

① 例如，雖然中日關係因釣魚島爭端變得緊張，但2014年的中國訪日遊客數已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全年或逼近200萬人次（“環球網”，2014-09-28）。又，2014年，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就職占整體65%（“中新網”，2014-09-16）。

② 關於這種不同於國家或政治共同體的基本政治觀念，基本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的社會行為—觀念結構，這裏未作展開，將另文專論。